

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的整体性和凝聚力。然而，这一时期也暴露了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深层次困境，如民主制度流于表象，民族文化内在冲突等等，而北洋军阀及其移植的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无力应对这种困境，民族构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性领导主体，这说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道路应该是多元和多样的，应符合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发展现状；这也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探索，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 【论 文】

### “突厥”一词在蒙古帝国解体后 中亚地区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政权精英当中的使用<sup>1</sup>

作者：Joo-Yup Lee（多伦多大学）  
译者：Sansa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引言

开始率兵西征花刺子模帝国之前，成吉思汗登上了一座山丘，在那里他祈求长生天对他的军事行动给予支持。根据拉施特·哀丁（Rashīd al-Dīn）为伊儿汗国统治者编纂的世界通史《史集》（*Jā mi' al-tavā rī kh*）中的描述，成吉思汗敬称长生天为“塔吉克和突厥的创造者（*ā farī nanda-i Tā zhī k u Turk*）”。当然成吉思汗不太可能确实使用了这样的称谓，但在中世纪的其它史料里，“突厥”（*Turk*）一词的确经常被用来指代蒙古帝国的上层统治者和核心部落。比如，成吉思汗后裔，希瓦汗国（*Khiva*）阿剌卜沙王朝（*'Arabshā hid*，译者注：以黄金家族昔班系的阿剌卜沙汗命名）的阿布·加齐·巴哈杜尔汗（*Abū al-Ghā zī Bahadur Khan*，公元1644-1663年在位）编纂了一部关于蒙古帝国黄金家族和（公元13世纪的）蒙古高原各部历史的著作。他将这部著作命名为《突厥世系》（*Š ejere-i Türk*）。与拉施特·哀丁和阿布·加齐·巴哈杜尔汗的用法迥然不同的是，现当代的历史学家用法中，“突厥”一词往往只指代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群体。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中世纪史料中的“突厥”指代的也是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群体。尽管如此，中西亚史专家们也知道，在中世纪穆斯林史料当中，“突厥”一词经常被用来统称所有内亚地区的游牧群体。研究穆斯林史料的学者M·A·沙班指出，“突厥”一词在穆斯林史料中使用得往往非常宽泛，其指代对象也包括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所以中世纪史料中的“突厥”一词最好不要被等同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突厥语族”（*Turkic-speaking*）群体。

19世纪晚期的一位历史学家，纳依·埃利亚斯（*Ney Elias*）也讨论过中世纪穆斯林史料中“突厥”一词的指代对象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突厥语族群体间的区别。他在公元16世纪中期编著的关于蒙兀儿斯坦（*Moghul Khanate*，译者注：即东察合台汗国）诸汗（译者注：黄金家族察合

<sup>1</sup> 英文原文发表于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第59卷（2016年）第1期，文章已于2019年5月25日修改。  
[https://mp.weixin.qq.com/s/7gV7zO8NIjbxnZNpu\\_EIw](https://mp.weixin.qq.com/s/7gV7zO8NIjbxnZNpu_EIw)（2019.7.30下载）



台系)和朵豁刺惕部(Dughlā t)诸埃米尔(amī r)事迹的《拉失德史》(Tā rī kh-i Rashī dī, 译者注:《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尔扎·海达尔出身于朵豁刺惕部)的英文译本导言中解释道:“突厥”一词在中世纪穆斯林史料中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代的是“族裔”,另一方面指代的是与族裔无关的游牧的社会组织形式。埃利亚斯认为,当“突厥”一词用来指代蒙古帝国的上层统治者和核心部落时,应当将其理解为指代所有内亚地区的游牧人群。本文作者认为,拉施特·哀丁和阿布·加齐·巴哈杜尔汗在使用“突厥”一词来指代蒙古帝国的上层统治者和核心部落时,指代的不仅是他们游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也指代他们的“族裔”。

本文着重梳理中世纪中亚地区黄金家族(Chinggisid)和帖木儿家族(Timurid)精英所使用的“突厥”一词的含义,并解释为什么蒙古帝国上层统治者及核心部落的后人会称自己为“突厥”。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本文首先讨论“突厥”一词在突厥汗国(隋唐时期)兴衰时期的用法和含义,这一时期,“突厥”一词仅仅用来指代(阿史那家族统治的)突厥汗国的核心部落,而非用来指代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蒙古帝国兴起以来,内亚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古代的史料已经基本不再使用“突厥”一词。本文第二部分讨论伊斯兰世界中“突厥”一词的用法。本文认为,“突厥”一词在穆斯林史料中往往用以统称内亚所有的游牧人群。本文发现,中世纪穆斯林史学家往往把所有内亚游牧人群都看成一个整体,称为“突厥”,而对这些人群中语言上的差异并无清晰的概念。本文第三部分讨论内亚地区游牧人群中的部落结构和身份认同。本文发现,内亚游牧群体往往是由语言背景不尽相同的各种部落构成的,而共同意识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各部落原本使用的语言间的亲缘与否。因此本文认为,中世纪中原和伊斯兰世界的史学家们并不依据“突厥语族或非突厥语族”来划分内亚地区的各部落联盟。本文第四部分详细讨论中亚地区和伊朗地区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政权史料中“突厥”一词的含义。本文发现,“突厥”一词是相对于“塔吉克”(Tajik)一词来说的,而并非“蒙古”(Mongol)一词的反义词,“塔吉克”一词用来指代使用伊朗语族语言的定居群体。本文显示,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政权世系中的“蒙古属于突厥中最显赫的一支”的表达,并不是西迁中亚地区和钦察草原的蒙古高原各部语言上突厥语族化的效应,而是他们对自己是成吉思汗后裔的自豪感的独特表达方式。

## “突厥”一词在古代内亚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含义

“突厥”这一称呼的开始使用与公元六世纪中叶建立突厥汗国的“蓝突厥”(Kök Türk)有关。当时“突厥”一词的指代对象是狭义的,只包括突厥汗国的政权及核心部众。突厥汗国的政权及核心部众将“突厥”一词作为自称来使用,而不是用来指代所有在当时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人群。例如,在鄂尔浑河碑铭(Orkhon inscriptions)当中,只有突厥汗国的核心部众才被称为“突厥”,而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如九姓乌护(Toquz Oghuz),黠戛斯(Qirghiz),薛延陀(Tarduš),铁勒(Tölis)等,有专门的称呼而并不被称为“突厥”。

而且“突厥”一词也不被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用作自称,包括公元八世纪中叶取代突厥而称雄蒙古高原的回鹘(Uighur)。在回鹘汗国的官方碑铭中,“回鹘”(Uyγur)一词用作自称,而“突厥”(Türük)一词只用来指代之前被回鹘视为敌人和压迫者的“蓝突厥”。



例如，在《铁尔痕碑》（Taryat (Terkhin) inscription）中，回鹘汗国的英武可汗（药罗葛磨延啜，El Etmış Bilgä）这样说道：“我二十八岁那年，是个蛇年，我打散了突厥人的汗国并摧毁了他们。”英武可汗在《磨延啜碑》（Moyun Čor (Šine-Uсу inscription）中记载的语录同样说明了突厥部落联盟和回鹘部落联盟的区别：

我当时听说乌苏米施特勤（Özmiş Tegin）被拥立为突厥人的汗。于是羊年（公元 743 年），我带领我的军队出征了……我俘虏了乌苏米施可汗……之后突厥人就停止存在了。

和古代内亚地区“突厥”一词只指代突厥汗国的核心部众的用法类似的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史学家们在官修史中使用的“突厥”一词也只用来指代突厥汗国的核心部众，而对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使用其他的称呼，如铁勒，回鹘，黠戛斯等。例如，《旧唐书》中记载到：“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郡分散，众渐寡弱。”相类似地，最初从铁勒部落联盟分出的回鹘在中原王朝的官修史中也不被称作“突厥”。而从西突厥处月部中析出的沙陀部，在《新唐书》中被描述为“西突厥别部”。相比之下，中原史书中并没有如此描述回鹘的源流。

实际上，中原王朝的史学家既没有把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也没有明确地把这些部落与可能是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Mongolic or Para-Mongolic）部落区别开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古代中原王朝史书中习惯于把后来出现的部落联盟的起源追溯到之前兴盛过的部落联盟的描述。古代中原官方史书中，突厥，铁勒，回鹘三个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都被描述为起源于匈奴。而契丹，奚这两个可能是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则被描述为起源于东胡。同时，一些中原史学家也指出，突厥可能源于匈奴地之北的“索国”或“平凉杂胡”。《魏书》中对铁勒（高车）的记载也是将其描述为匈奴兴起前的“赤狄”余部。除此以外，一些中原王朝官史中甚至把契丹和奚也视为起源于匈奴。类似的也有《新唐书》中把后来（成吉思汗出身的）蒙古部的前身室韦和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丁零联系起来的描述。

中原王朝史书中不把游牧人群按“突厥语族”或“非突厥语族”来区分的做法也反映在“鞑靼”一词的使用上：“鞑靼”一词被用来泛指蒙古帝国兴起前夕蒙古草原上所有的游牧部落联盟。在南宋赵珙所著的《蒙鞑备录》中，记载了三类鞑靼：黑鞑靼，白鞑靼，生鞑靼。“黑鞑靼”包括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译者注：即“尼伦蒙古”和“迭列斤蒙古”），白鞑靼指代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汪古部（Önggüt）。换句话说，“鞑靼”一词泛指蒙古高原上最初的（成吉思汗出身的）蒙古部，一些讲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和一些详情不明的部落。

伯希和（Paul Pelliot）发现的古代吐蕃文文献中，有一卷是由吐蕃政权派去考察北方草原的五位使者呈送给回鹘汗国统治者的文书。由于这部回鹘汗国文书的编写者来自吐蕃，我们得以从文书中了解到吐蕃政权观察内亚游牧部落的视角。吐蕃使者们访问过的部落联盟列表中，提到了奚（He），突厥（Drugu），契丹（Ge-tan），黠戛斯（Gir-tis），回鹘（Hor/Ho-yo-hor），葛逻禄（Gar-log）等。和中原官方史书及古突厥文/回鹘文碑铭的用法不同的是，“突厥”一词也被用来指代一些不属于突厥汗国核心的部落联盟，如回鹘汗国王族出自的铁勒部落联盟。但是，“突厥”一词并没有用作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部落联盟的泛称。文书并没有把突厥汗国、佩切涅格（Be-ča-nag）、黠戛斯和突骑施（Du-rgyus）等都囊括起来统称为“突厥”。除此以外，吐蕃使者的文书也可能是把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公元 4-7 世纪称雄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部落联盟称作“突厥”。有意思的是，本来指代回鹘的“霍尔（Hor）”一词，后来在吐蕃文献中开始指代



元朝的“蒙古”。这些用法说明吐蕃文书的作者们和中原史学家一样，并没有把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都囊括在一个类别名下，也并没有把各种部落联盟按“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的分法来进行区别。

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新的游牧部落联盟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整合了众多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或汗国，如乃蛮（Naiman）、汪古、黠戛斯、回鹘等。同时，作为提供关于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和成吉思汗出身的信息方面最重要史料的《蒙古秘史》（译者注：即《元朝秘史》），并没有使用“突厥”一词来指代这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蒙古秘史》中，后来被并入蒙古帝国的钦察（Kibča' ud）、康里（Qanglin）等部落联盟又不被称作“突厥”。很明显，公元 13 世纪时，蒙古高原上可能已经不再使用“突厥”一词。“突厥”一词在《蒙古秘史》中甚至都没有出现过。

公元 17 世纪时成书的藏传佛教传统影响的回鹘式蒙古文编年史《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či，萨冈彻辰著）和《蒙古黄金史》（Altan Tobči，罗卜藏丹津著）中，也没有使用“突厥”一词来指代任何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而是使用“托克马克（Тоγмаγ）”一词来指代（译者注：和北元同时期的）钦察草原（Qipchaq Steppe）/术赤兀鲁思（Jochid Ulus，译者注：即金帐汗国）的黄金家族政权及其部众。清朝关于北元黄金家族世系的《蒙古世系谱》（罗密著），在罗列（公元 13 世纪）并入蒙古帝国的诸部落和政权时，也没有使用“突厥”一词。除此以外，《蒙古世系谱》并没有按语言来对葛逻禄、乃蛮、回鹘、斡亦剌惕（Oyirat）、女真（Jurchen）等各种部落联盟进行分类。

元朝时期，中原汉人出身的官员对统治阶层中那些并非出身于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的精英们的称呼为“色目人”。陶宗仪于公元 1366 年撰写的《南村辍耕录》中列举了各类“色目人”和“蒙古人”，但并没有对“色目人”按语言进行分类，例如钦察（Qipchaq）、康里、党项（Tangut，唐兀，唐古特）、阿速（As）、罗斯（Rus'）等。实际上，公元 14 世纪早期编纂的元朝律令汇编《元典章》中，甚至会把出身于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的人（即“达达”）和回鹘统称为“色目人”。换句话说，元朝的“汉人”官员也并没有按语言来对内亚各人群进行分类。

元朝以后的中原王朝官方史书沿袭了之前的用法。例如，《明史》当中有关于北元“鞑靼”、“瓦剌”及同时期中亚地区人群的描述，既没有使用“突厥”一词来指代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群，也没有进行所谓“突厥语族”，“蒙古语族”之类的区分。《明史》对帖木儿帝国（Timurid）的使臣和商人使用的是“回回”的称呼，意为穆斯林。同时也不奇怪的是，在《明实录》中，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哈萨克汗国部众（Qazaq）被称作“鞑靼回夷”。值得注意的是，“鞑靼”一词在《明史》中指代的是黄金家族统领的北元本部（译者注：即有别于“瓦剌”）。

小结一下，通过对汉文、吐蕃文及内亚游牧人群自己留下来的史料中“突厥”一词用法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内亚地区东部和中原古籍中的“突厥”一词并非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人群的统称，而且在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一词在蒙古高原地区就逐渐停止使用了。“突厥”一词用法的变化，及其之所以从未被用来泛指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人群，是因为古代内亚人群的身份认同并不是由语言的类别（译者补充解释：而是政权）来决定的，接下来详细阐述这一点。



## “突厥”一词作为伊斯兰世界对内亚游牧人群的统称

和古代内亚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突厥”一词专门指代突厥汗国及相关部落的用法不同的是，伊斯兰世界中“突厥”一词有着广泛得多的含义。尽管有些中世纪的穆斯林学者使用的“突厥”一词有更狭义更具体的指代，总的来说穆斯林学者使用的“突厥”一词倾向于指代锡尔河北所有的游牧人群，无论这些人群使用的是什么类别的语言。例如，穆斯林地理学家加尔德兹（Gardī zī）和马尔瓦兹（Marvazī）把包括使用芬兰-乌戈尔语族和斯拉夫语族语言在内的所有北方人群统称为“突厥”。公元11世纪齐亚尔王朝（Ziyarid，译者注：控制今伊朗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凯卡布斯（Kai Kā'ū s）也把大部分的内亚游牧人群统称为“突厥”，类似于波斯文经典史诗《列王纪》（Shā h-nā ma）把阿姆河北的包括一些使用伊朗语族语言的所有游牧部落称作“图兰”的用法。在凯卡布斯的著作《卡布斯纪》（Qā bū s-nā ma）中，“突厥”一词不仅指代古兹（或“乌古斯”，Oghuz），钦察（Qipchaq），奇吉尔（Chigil）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而且指代吐蕃，奚（Qay），鞑靼（Tatar）等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

他们当中脾气最不好的是古兹（Ghuzz）和钦察，脾气最好最热情的是于阗（Khutanese）、葛逻禄（Khallukhī s）和吐蕃，最勇猛的是图尔盖（Turghay，译者注：可能指代活动于今哈萨克斯坦西北部图尔盖河流域的部落联盟），最吃苦耐劳和活跃的是鞑靼和样磨（Yaghmā），最懒惰的是奇吉尔。

喀喇汗王朝伟大的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ūd al-Kāshgharī，约公元1075年在世）对内亚各游牧部落的描述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学者对这些人群众体的理解。在他的著作《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ġāt al-Turk*）中，“突厥”一词一方面狭义地只指代喀喇汗王朝的居民而不包括古兹部落联盟，另一方面又广义地指代很多人群众体，既包括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古兹和钦察，也包括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党项、鞑靼、契丹（Khitan）和奚。而且喀什噶里认为，古代突厥语族文献中的神话英雄人物阿勒普统阿（Alp Er Tonga）和波斯文史诗《列王纪》中图兰部落的英雄阿夫拉西亚伯（Afrāsiyāb）是一个人物。于是很自然地，喀什噶里并没有把“突厥”追溯到隋唐时期的突厥汗国或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古代人群，而是把“突厥”描绘成诺亚的儿子雅弗（Japheth）的某个儿子的后裔。这一点符合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史观，即认为所有人群都是诺亚（Noah）的三个儿子，含（Ham）、闪（Shem）、雅弗的后裔：

“突厥”最早有二十个部落，他们都是诺亚的儿子雅弗的儿子突厥（Turk）的后裔。

马木鲁克王朝（Mamluk）的史学家们使用的“突厥”一词，也广义地包括一些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群。虽然巴赫里马木鲁克王朝（Bahrī Mamluk）统治阶层的主体来自钦察各部落，但也有一些来自其他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群，如哈喇契丹（Qara Khitai）、最初的蒙古各部（Tatar，“鞑靼”）以及斡亦剌惕（Oyirat）各部等。然而马木鲁克王朝的编年史作者们把所有这些人群众体都称作“突厥”。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编年史中，本来指代古代蒙古各部的“鞑靼”一词是按“突厥”一词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大卫·阿亚隆（David Ayalon）含混地认为，这里的“鞑靼”一词成为“突厥”的同义词，是因为蒙古帝国军队主要由“突厥”构成。可是，马木鲁克王朝史学家遵循的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用法，即把各种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群体也算作“突厥”。所以一位马木鲁克学者把古代蒙古语描述为“纯粹的突厥语”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有意思的是，穆斯林史地学家们经常会描述“突厥”人的体貌特征。例如，马尔瓦兹认为“突厥”人和北非东部的人在体貌上有较大的差异：“突厥”人身材矮小，眼睛、鼻孔、嘴都比较小，而北非东部的人身材高大，眼睛、鼻孔、嘴角都比较大。塔巴里（Ṭabarī，-923）在《历代先知和帝王史》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诺亚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又各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闪生了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庭，这三个儿子都有自己的美德；雅弗生了突厥，斯拉夫，歌革(Gog)，玛各(Magog)，这四个儿子一无是处；含生了科普特，苏丹，柏柏尔。黑皮肤卷发的都是含的后代，圆脸小眼睛的都是雅弗的后代，而面容俊朗头发美丽的都是闪的后代。

凯卡布斯在他的《卡布斯纪》中也把“突厥”人描述为“头型很大(sar-i buzburg)，脸很宽(rūy-i pahn)，眼睛细长(chashmhā-i tang)，鼻子扁平(bīnī-i pakhch)，嘴唇和牙齿并不美观(lab va dandān na nīkū)。类似地，中世纪一些波斯语诗人也把“突厥”人描述为脸圆、眼睛细长、嘴小。这些描述说明，伊斯兰世界的史地学家们一般认为，“突厥”人有着内亚人的体貌。

一些穆斯林史地学家在讨论“土库曼”(Turkmen)一词的词源时也提到了“突厥”人的这类体貌特征。“土库曼”一词从中世纪以来主要用来指代突厥语族中的“古兹(乌古斯)”，包括塞尔柱人和早期的奥斯曼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解释说，“土库曼”一词源于亚历山大大帝对22个古兹男性的称呼 Turk mā nand(图尔克玛南德)，意思是“这些人像突厥”。拉施特·哀丁对“土库曼”部落联盟及“土库曼”一词的来源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词的历史并不悠久。过去所有生活在荒野地区，长得像突厥人的部落都被称作“突厥”，每一个部落有自己的口号。后来古兹诸部落迁出他们的祖居地，来到河中地区和伊朗，慢慢发展壮大，体貌也越来越像塔吉克(定居居民)。因为他们不是塔吉克，塔吉克人称他们为“土库曼”，“像突厥的”。

哈菲兹·塔纳什·布哈里(Hā fiz Tanī sh Mī r Muḥammad Bukhā rī)在他的著作《诸王功绩纪》(Sharaf-nā ma-i shā hī 或 Abdallā h-nā ma)中对“土库曼”也有类似的解释。他说，古兹人在南迁河中地区和伊朗以后，他们原来的“突厥”长相慢慢发生了变化，和原来不一样了(ṣūrat-i Turkāna-i īshān bar qarār-i khud namānd)。成吉思汗后裔、希瓦汗国的阿布·加齐·巴哈杜尔汗(Abū al-Ghāzī Bahadur Khan)，对于土库曼人的体貌特征有更为生动的描述：

五六代过后，由于水土的影响，他们(土库曼)的体貌和原来不一样了，他们的下巴变窄了，眼睛变得越来越大，脸型开始变小，鼻子开始变大。

“土库曼”一词源于“像突厥的”这一表达的说法，只是关于“土库曼”一词来源的一种猜测，更不能说明“土库曼”人的来源。尽管如此，因为古籍中总是把“土库曼”和“一部分突厥人体貌特征发生变化”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古代突厥人具有东北亚人的体貌特征，尤其是在蒙古帝国时期及其解体后的中亚地区。这一点意味着，包括公元13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在内的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人群在伊斯兰世界也会被识别为“突厥”。小结一下，“突厥”一词在伊斯兰世界的语境当中是对所有内亚游牧人群的统称。穆斯林学者们也没有对这些人做语言上的分类。

## 内亚地区的身份认同和部落形成过程



“突厥”一词在穆斯林世界用法中非常宽泛的内涵外延与“突厥”一词在内亚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狭义的具体的内涵外延看似互相矛盾。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突厥”一词在穆斯林世界的用法还是在东亚的用法都可以反映出内亚地区部落形成过程和身份认同的一些特点：

**特点一：内亚地区的游牧部落联盟往往是由语言背景不尽相同的各种部落组成的。**例如，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北魏（公元 386-534 年）的统治阶层的部落来源，既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也有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可能是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拓跋部，在从蒙古高原东北部向华北地区迁徙的过程中，融合了若干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铁勒（丁零）部落，如纥骨和乙旃。也就是说，拓跋部落联盟的四分之一来源于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丁零部落联盟。

契丹部落联盟也是由语言背景不尽相同的部落组成的。可能是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契丹部落联盟建立了辽朝，并在公元 10 世纪到 11 世纪统治了包括华北和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域。辽朝的统治阶层中，包括一些回鹘氏族，如和耶律氏并称为辽朝两个最显赫氏族的萧氏。契丹部落联盟中的回鹘成分很多，以至于有一句谚语：契丹中的一半是回鹘。后来的（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可以向前追溯到的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室韦部落联盟，估计也在公元八世纪中叶融合了一些回鹘成分。《旧唐书》中记载，黠戛斯部落联盟灭回鹘汗国后，一些回鹘汗国的遗民投奔了室韦部落联盟，“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分，七姓室韦各占一分。”

成吉思汗在公元 13 世纪初建立的蒙古帝国（“大蒙古国”）的部众（ulus），也是一个语言背景多样的共同体。这些部众包括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译者注：“尼伦蒙古”和“迭列斤蒙古”）和其他一些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如塔塔儿、斡亦剌惕以及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如乃蛮、汪古。《蒙古秘史》的佚名作者称这些部众为“众部落百姓/毡帐百姓”（原文：sisgei to' urqatu ulus）。“大蒙古国”后来又将其他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整合了进来，例如钦察草原上的康里（Qanqli）和钦察（Qipchaq），蒙古高原各部 and 后来加入的康里、钦察等，构成了后来多个黄金家族政权部众的基础。

除此以外，不仅仅是以黄金家族（术赤系）为核心的乌兹别克兀鲁思（Uzbek ulus，“月即别”）和后来的哈萨克兀鲁思（Qazaq ulus）是由来自钦察草原和蒙古高原非常多样的部落组成的，而且北元的部众也是如此。北元的部众融合了许多并非来源于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的部落，如党项、钦察、阿速惕（阿兰，Asud/Alan，译者注：源自北高加索地区的部落联盟）等。公元 16 世纪推翻瓦剌（斡亦剌惕）的霸主地位而重新统一北元部众的满都海彻辰（Mandukhai），来自语言已经蒙古语族化的汪古部（Enggüd）。公元 16 世纪下半叶重建黄金家族在蒙古高原霸主地位的俺答汗（Altan Khan，1508-1582）的部分封地的部众也是来自汪古部。同理，今天蒙古国（外蒙古）最大的部落联盟喀尔喀（Khalkha），也囊括了很多来源并非最初的蒙古部落联盟的部落，如阿速惕（阿兰）、唐古特、喀喇沁（Kharachin，部分源自钦察）、汪古、萨尔特（Sartuul/Sart）等。需要指出的是，直至今日内亚地区各种部落间的融合仍在继续，比如蒙古国（外蒙古）西部的原来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改用蒙古语族语言（译者注：喀尔喀语），例如霍屯人（Khoton）、乌梁海人（Uriankhai）等。

**特点二：内亚地区使用相似语言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不一定会相互认同或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北元时期鞑靼（黄金家族为核心的北元本部）和瓦剌之间的恩怨和隔阂。



正如后突厥汗国灭亡后，回鹘部落联盟并不认同自己和“突厥”是一群人一样，蒙古帝国分裂后及元朝灭亡后，新兴起的瓦剌有着和鞑靼相异的身份认同。北元的鞑靼也不视瓦剌为“自己人”。

《蒙古黄金史》(Altan Tobči)中多处把“蒙古”(译者注：即“鞑靼”)和“瓦剌”描述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群：

马哈木(巴图拉)丞相(Batula Ć ingsang)和乌格齐哈什哈(Ügeĉ i Qasay a, 译者注：可能和鬼力赤是同一人)首次统领瓦剌四万户(Dörben Tümen Oirad)并与蒙古(“鞑靼”)为敌。据说，所有蒙古(“鞑靼”)的统治权落入了瓦剌之手。

同时，语言背景的差异也并不妨碍不同部落(或部落联盟)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例如，《后汉书》中记载，在匈奴帝国解体后，许多北匈奴部落投奔了鲜卑，而不是投奔南匈奴：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

同理，黄金家族统领的北元本部(“鞑靼”)很认同他们在钦察草原地区已经伊斯兰化、突厥语族化的亲戚们。据《蒙古源流》记载，一位黄金家族成员和他的乃蛮(Naiman)仆人，为了躲避瓦剌也先太师(Esen Taishi)的追杀，投奔了钦察草原。他们是这么说的：“托克马克(To γ ma γ)的汗们是术赤(Jochi)的后裔，是我们的亲戚(töröl)。”

**特点三：在能否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内亚地区的人群经常更加强调体貌特征上的相似性而不是语言背景上的相似性。**我通过讨论公元13世纪蒙古高原各部，钦察草原突厥语族各部，以及“土库曼”人三者对彼此的看法来阐述这一点。

根据库尔德(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 r, 1160-1233)的记述，当时为花刺子模帝国服务的驻扎在撒马尔罕的康里(Qanqli, 东部钦察)部军人在向蒙古帝国西征军倒戈时是这么说的：“我们都是一个种系的(naḥnu min jins ha'ulā'i)。他们不会杀我们的。”相类似地，统帅西征钦察草原的蒙古帝国大将哲别(Jebe)和速不台(Sübe'etei)能够利用钦察草原各部和蒙古高原各部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来破坏钦察部落联盟和阿兰部落联盟的同盟关系，具体办法就是向钦察各部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和你们是一个种系的(naḥnu wa'antum jins wā ḥid)。”

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蒙古帝国人士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和蒙古高原各部的亲近感。虽然主体出身于钦察各部的马木鲁克军事强人们一般避免和埃及当地人通婚，他们中的一些的确选择了迎娶来自蒙古高原各部的妇女来做自己的妻妾。例如，卡拉温苏丹(Sultān Qalāwūn, 1279-1290年在位)所有的妻妾都娶自蒙古高原各部。也许纳西尔苏丹(Sultān al-Nāsir, 1293-1341年在位，期间两度中断)的以下评论可以反映马木鲁克王朝统治阶层对蒙古高原各部的亲近感：

一直没能收拾你们(译者注：这里指代的可能是东征的十字军政权)的原因是我们和鞑靼人(即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之间的争战。如今，感谢真主，我们和他们已经和睦相处。

我们是一个种系的(naḥnu wa-iyā hum min jins wā ḥid)，我们不会互相背弃的。

与此反差鲜明的是，马木鲁克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土库曼”人则并没有如对待蒙古高原各部一样的特殊的亲近感。来自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的逃难者或战俘经常可以加入马木鲁克王朝的精锐部队甚至登上苏丹的宝座，而加入马木鲁克王朝的土库曼人被给予的社会地位就低一些，而且很难晋升。值得一提的是，加入马木鲁克的土库曼人有些被称作“鲁米”(Rūmī)。奥斯曼人则被称作“奥斯曼尼亚”(Uthmā niyya)、“鲁姆”(Rūm)或“土库曼”(Turkmān)。



在中亚地区，不少黄金家族政权的部众是使用突厥语族钦察语支语言的游牧人群，然而这些钦察语人群并不认同使用突厥语族古兹（乌古斯）语支语言的“土库曼”人，反而认为他们比自己“低一等”。例如，在希瓦汗国（Khiva），直到公元 19 世纪被沙俄征服为止，当地的“乌兹别克”（译者注：源自乌兹别克汗国，术赤第五子昔班后裔的部众）和“土库曼”一直界限分明。19 世纪时访问希瓦汗国的一位旅行者记录说，由于两个群体来源不同，他们互相并不怎么通婚。

小结一下，在近现代以前的内亚地区，游牧部落联盟经常由语言背景不尽相同的多样的部落组成。而且很重要的是，语言上的相近并不意味着会形成相互认同或共同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原的史学家们并没有用“突厥”一词泛称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因为当时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并不称自己为“突厥”，而且这些部落联盟和“突厥”之间并没有形成相互认同或共同意识。与此同理，中世纪穆斯林学者在使用“突厥”一词时，这个泛称并不局限于指代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而且这些穆斯林学者也并没有按语言背景对内亚各游牧部落进行分类。

## 中亚地区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政权“突厥”认同的含义

许多中亚地区和伊朗地区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包括黄金家族政权和帖木儿家族政权）时期的史料是用“突厥”一词来指代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成吉思汗后裔的，这一点将在后面阐述。在这一部分，我先说明一点，那就是在穆斯林学者笔下，公元 13 世纪时的蒙古高原各部往往被视为“突厥”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再详细探究黄金家族政权和帖木儿家族政权史料中“突厥”一词的含义。

例如，公元 14 世纪时广泛游历蒙古帝国各后继政权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ūṭah, 1304-1377）在他的《游记》（Rihlah）中，把蒙古高原各部描绘为“突厥”的一个分支。他在列举术赤兀鲁思（Jochid Ulus，即一般所说的“金帐汗国”）首都萨莱城（Saray）内多样来源的居民时，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钦察人进行了区别。然而，当他在把组成术赤兀鲁思的所有游牧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来泛指时，他用的词是“突厥”。类似地，同时期来自突尼斯的著名学者，伊本·卡尔敦（Ibn Khaldūn, 1332-1406），在他的自传里面也把蒙古高原各部定义为“突厥”的一个分支（min shu‘ūb al-Turk）。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伊本·卡尔敦把专门讨论蒙古高原各部的那一章的标题命名为“关于突厥人一支鞑靼人的统治的报告”（al-khabar ‘an dawlat al-Tatar min shu‘ūb al-Turk）。

帖木儿帝国的旅行家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āh, 1392-1450）也视蒙古高原各部为“突厥”的一个分支，他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比拟为“突厥人的古莱什部落”（译者注：先知穆罕默德出身于古莱什部）。伊本·阿拉伯沙在他的著作里面主要使用“鞑靼”一词来指代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然而，在指代帖木儿帝国的军队时，“突厥”和“鞑靼”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换句话说，他把“蒙古高原各部”和“突厥”的内涵等同了起来。《献给苏丹纳西尔的年代史》（Tabakāt-i-Nāṣirī）一书的作者朱兹詹尼（Jūzjānī, 公元 1193 年生，译者注：马木鲁克王朝的史学家）把蒙古高原各部和契丹人（Khitan）划为“突厥”人的一种。例如，他是这样说的：“最早出现的突厥人是源自‘秦’（Chin，译者注：泛指古代中国北方）的哈喇契丹（Qara Khitai，



译者注：即西辽）诸部。”朱兹詹尼还写道：“蒙兀儿（蒙古）人（Mughal）兴起于“秦王国”（Chin，译者注：泛指古代中国北方）……各类史书中一般都写，每当突厥人崛起，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蒙兀儿人则是新的一种突厥人……”。奥斯曼帝国的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Muṣṭafā ʿĀlī）也把古代蒙古高原各部和突厥视为同源。在他的著作《历史的本体》（Kūnhū'l-aḥbā r）中，他写道，奥斯曼帝国（的来源）“是不能与突厥和鞑靼（即蒙古高原各部）各部落割裂开来的”（ḳabā ʿil-i Etrā k u Tā tā r dan hā rij degül）。在描述诺亚的儿子雅弗的儿子们时，穆斯塔法·阿里又说突厥和蒙古高原各部都是雅弗的后裔。尽管他很少把“突厥”一词作为泛称来使用，他的确把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后裔）昔班系乌兹别克汗国的汗们称作“突厥人的可汗”（havā ḳī n-i Türk）。

和穆斯塔法·阿里相似，奥斯曼帝国著名旅行家埃弗里亚·切列比（Evlīya Çelebi, 1611–约 1687）也视古代蒙古高原各部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同源。例如，在讨论鞑靼（即古代蒙古高原各部）其中的一个群体时，他补充道，“甚至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家族）和所有的土库曼人都源于鞑靼”（Hattā ʿĀl-i Osmā n ve cumle ḳavm-i Türkmā n dahi ḳavm-i Tatar' dır）。埃弗里亚·切列比又写道：“的确，根据一些历史学家，奥斯曼王朝源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的王朝。奥斯曼家族是黄金家族的表堂亲（Hakkā ki ʿĀl-i Osmā n be-ḳavl-i müverrihī n ʿĀl-i Cingiziyā n neslindendir kim Cingiz Hā n' in ammī zā delerindendir）。”总结一下，尽管穆斯塔法·阿里和埃弗里亚·切列比使用的“突厥”一词主要是指代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都暗示蒙古高原各部和奥斯曼人是一群人。

同理，中亚地区和伊朗地区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包括黄金家族政权和帖木儿家族政权）的官方史料有时也用“突厥”一词来指代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黄金家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儿汗国史学家拉施特·哀丁（Rashī d al-Dī n Faḳlallā h Hamadā nī , 1247–1318）为伊儿汗国（Ilkhanid）的合赞汗（Ghazan Khan, 公元 1295–1304 年在位）编纂的大型世界通史《史集》（Jā mi' al-tavā rī kh）。在这部著作中，拉施特·哀丁把（成吉思汗兴起时）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落都称为“突厥”，并把最初团结在成吉思汗周围的蒙古高原各部称作“蒙古（蒙兀儿）突厥”（Atrā k-i Mughū l）。拉施特·哀丁在描述蒙古帝国的军队时，也同时使用了“蒙兀儿”（Mughū l）和“突厥”（Türk）这两个词。

帖木儿帝国（译者注：源自巴鲁刺思部）的统治者兀鲁伯（Ulugh Beg, 1394–1449）在他的关于黄金家族政权历史的著作《四兀鲁思史》（Tā rī kh-i arba' ulū s）中，称呼西征花刺子模帝国的蒙古帝国军队为“突厥”。因为这一用法见于《四兀鲁思史》的简化版史料《突厥世系谱》（Shajarat al-atrā k）中，所以更确切地说，这一用法应该归功于《突厥世系谱》一书的佚名作者。兀鲁伯把蒙古帝国的军队描述为“为上天挥剑的突厥人”（Türk-i tī gh-zan-i falak），并把他们比喻为“旭日”。兀鲁伯还赞美了蒙古帝国军队的尚武精神和勇猛，称呼他们为“突厥人”。帖木儿王朝后来的一位史学家，赫万达米尔（Khvā ndamī r），在他的著作《传记之友》（Hab ī b al-siyar）中，也把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称为突厥的一支。例如，他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的人士称作“突厥人的苏丹”（salā tī n-i Türk）。和拉施特·哀丁一样，赫万达米尔同时使用“蒙兀儿”和“突厥”这两个词来指代河中地区（Transoxiana）蒙古帝国的军队。



一些（黄金家族昔班系）乌兹别克汗国的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将黄金家族和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称呼为“突厥”。兀鲁伯《四兀鲁思史》简化版的佚名作者把他的作品命名为 *Shajarat al-atrā k*，意为“突厥世系谱”。希瓦汗国的阿布·加齐·巴哈杜尔汗（*Abū al-Ghā zī Bahadur Khan*），把他撰写的黄金家族和来自蒙古高原各部的通史著作命名为 *Š ejere-i Türk*，意为“突厥世系”。这两部史料名称说明两位作者都把黄金家族和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视为“突厥”。

也许布哈拉汗国（译者注：当时由来自阿斯特拉罕汗国的黄金家族统治）史学家麻赫穆德·伊本·瓦力（*Maḥmūd b. Amī r Valī Balkhī*）对“突厥斯坦”（*Turkistā n*）居民的统称的演变的解释能更好地反映“蒙古高原各部/黄金家族”和“突厥”两个概念内涵的等同性。在他于公元16世纪完成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美德的奥秘》（*Baḥr al-asrā r fī mānā qib al-akhyā r*）中，有一部分是介绍黄金家族政权历史的。根据麻赫穆德·伊本·瓦力的说法，“突厥斯坦”居民的正式名称从“雅弗的儿子突厥”开始一直是“突厥”，直到蒙兀儿汗（*Mughū l Khan*）为止。从蒙兀儿汗开始，“突厥斯坦”居民的正式名称变成了“蒙兀儿”。从乌兹别克（月即别）汗（*Uzbek Khan*）开始，正式名称变成了“乌兹别克”。原文里他这样写道（波斯文）：

*Turk b. Yāfis tā hangām-i zuhūr-i Mughūl Khānmardum-i īn sarzamīn-rā Turk guftand va baʿd az tasalluṭ-i Mughūl Khān baraqvām-i ān ḥudūd har ki dar ān mamlakat būd ū-rā Mughūl khvāndand va pas az ...salṭanat-i Uzbek Khān sukkān-i īn sarzamīn-rā tā imrūz Uzbek mīgūyand*

与此相一致的是，麻赫穆德·伊本·瓦力定义的“突厥斯坦”涵盖从锡尔河（*Syr Darya*）开始一直到黄河（*Qara Mūren*，译者注：此处为中世纪用法）的广大区域，换言之就是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整个内亚草原地区。

本文的论点是，伊斯兰世界众多学者在概念上将“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突厥”等同起来的用法，不应该理解为是西迁中亚地区和钦察草原（金帐汗国）的蒙古高原各部从公元14世纪开始语言上突厥语族化的效应（译者补充解释：因为当时的概念中，蒙古高原各部本来就被涵盖为“突厥”的一种，就算使用的语言不是突厥语族）。最关键的一点是，在近现代以前的中亚和伊朗地区，与“突厥”（*Turk*）一词相对的是指代定居的伊朗语族居民的“塔吉克”（*Tajik*）一词，而并非“蒙兀儿（蒙古）”（*Mongol*）一词。下面我展开讨论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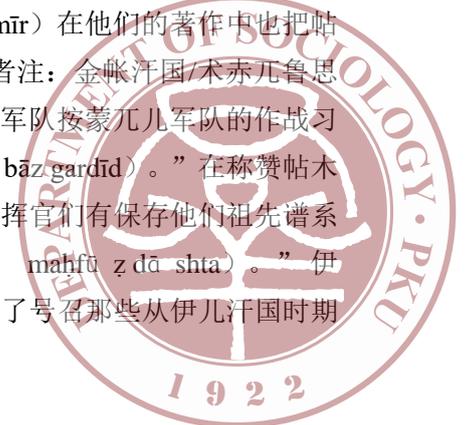
当时的钦察草原（译者注：指金帐汗国及其很多后继政权控制的地区），尽管几乎没有使用伊朗语族语言的定居居民生活（译者加：而都是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人群），“突厥”一词却并不被当地人用作自称。钦察草原游牧人群当中的口头文学和书面史料中没有出现“突厥”一词这一点即可说明这一点。例如，卡西姆汗国（*Kasimov Khanate*，译者注：金帐汗国/术赤兀鲁思的后继政权之一，由黄金家族统治，位于今俄罗斯梁赞州奥卡河流域）札刺亦儿部贵族卡迪尔·阿里别克（*Qā dir ʿAlī Bek Jalā yirī*）在他于公元1602年用察合台文（*Chaghatai*）撰写的《史集》（*Jā miʿ al-tavā rī kh*，译者注：不是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中，并没有使用“突厥”一词来指代钦察草原的游牧人群。卡迪尔·阿里别克使用的是“乌兹别克（月即别）”（*Uzbek*）一词来指代钦察草原，也就是今天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游牧人群。这样的用法也见于公元17世纪晚期成书的关于伏尔加河流域鞑靼人（*Volga Tatar*，译者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金帐汗国遗民，今天喀山鞑靼族和巴什基尔族的先民）历史的作者佚名古籍《成吉思汗传》（*Dāftar-i Čingiz-nā mā*）当中。《成吉思汗传》一书主要取材于钦察草原（金帐汗国）的民间记忆和口头



文学，讲述了很多关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生平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这部作品中并没有使用“突厥”一词来指代成吉思汗或帖木儿出身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相类似地，公元1744年由阿卜杜勒·阿法尔·克里木（‘Abd al-Ghaffār Qırımī）用奥斯曼土耳其文撰写的克里米亚汗国史书《史源》（‘Umdat al-aḥbār）使用了“鞑靼”（Tatar）和“蒙兀儿（蒙古）”（Moḡul）两个词来指代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和克里米亚汗国的部众们（Crimean Tatar）。例如，《史源》一书中把“鞑靼”人举行的一次非穆斯林仪礼的葬礼描述为“符合蒙兀儿和鞑靼的风俗”（‘ādet-i Moḡul ve Tātār）。在解释“卡尔梅克”（Qalmaq）一词的词源和含义时，《史源》将钦察草原上的游牧人群称作“蒙兀儿（蒙古）和鞑靼”（ḡavm-i Moḡul ve Tā tār）（译者注：此处的意思是，“蒙兀儿和鞑靼”有别于“卡尔梅克”）。除此以外，钦察草原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人群当中的口头文学传统中，也不使用“突厥”这个词作为自称。例如，今天诺盖族（Noghay）和克里米亚鞑靼族的史诗《勇士乔拉》（Chora Batır），哈萨克族的史诗《勇士康巴尔》（Qambar Batır）以及诺盖族（译者加：喀山鞑靼族，巴什基尔族，哈萨克族中也流传）的史诗《也迪古》（Epic of Edigü）中都没有提到“突厥”一词。钦察草原（金帐汗国地域）人群在当时没有自称“突厥”的另一个证据来自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施泰因（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他于公元1517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派遣出使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施泰因对钦察草原（金帐汗国地域）的鞑靼人是这样记录的：“如果被称作‘突厥’，他们会非常不高兴的，感觉是在数落他们……”

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他们在中亚地区突厥语族化的后人使用“突厥”一词作为自称与他们继续认同自己是“蒙兀儿（蒙古）”并不构成矛盾。尽管在蒙古帝国慢慢解体后，组成其后继政权的部众（ulus）开始使用多个不同的自称，但在中亚地区的史料中，“蒙兀儿（蒙古，Moghul）”一词仍然继续使用，用来指代突厥语族化的蒙古高原各部和他们的远祖。例如，察合台汗国（Chaghatayid Khanate）东部的那一支游牧人群（译者注：即常说的“东察合台汗国”）把他们的政权称作“蒙兀儿兀鲁思”（Moghul ulus）。

相类似地，西察合台汗国（western Chaghatayid ulus）和后来的帖木儿帝国的史学家也使用“蒙兀儿”这个词来描述帖木儿（Temür）本人的出身和生平。例如，一部梳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世系的古籍《世系赞》（Mu‘izz al-ansā b fī shajarat al-ansā b）把帖木儿描述为是“蒙兀儿（蒙古）后裔”。在提及帖木儿的远祖和他出身的部落时，《世系赞》的作者进一步写道，“为突厥人写史的编年史学者们是理智的人（信息可靠），他们记载说蒙古高原各部都源自逃至‘额尔古涅昆’避难的两个人（mu‘arrikhā n-i atrā k-i sā diq al-‘uqū l chunā ntaqrī r m ī kunand ki tamā mat-i aqvā m-i mughū l az nasl-i dau shakhşand ki darArkana Qutū qū n rafta bū dand）。”纳坦兹（Mu‘in al-Dīn Naṭanzī）和赫万达米尔（Khvādamīr）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把帖木儿和蒙古高原各部联系起来。在描绘帖木儿军队对白帐汗国（译者注：金帐汗国/朮赤兀鲁思的一翼）的兀鲁斯汗（Urus Khan）的进攻时这样写道：“帖木儿的军队按蒙兀儿军队的作战习惯投掷……然后返回（bar qā‘idai sunnat-i Mughūl sarā ān bi-andāktva bāz gardīd）。”在称赞帖木儿的“高贵出身”时，赫万达米尔写道：“蒙兀儿（蒙古）军队的指挥官们有保存他们祖先谱系的传统（umarā ‘-i mughū l payvasta silsila-i nasab-i ā bā uajdā d rā mahfū z dā shta）。”伊本·阿拉伯沙则写道，帖木儿本人认同自己是“蒙兀儿”。帖木儿为了号召那些从伊儿汗国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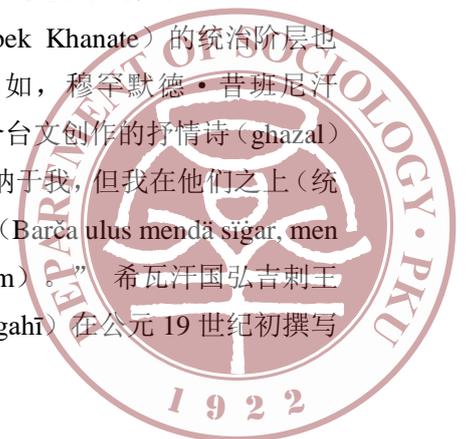


就已经定居在安纳托利亚的鞑靼人（即蒙古高原各部后人）加入到他和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 公元 1389-1402 年在位）之间的混战，在他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都是同一棵大树的枝杈（wa ajdā dunā ajdā dukum, fa kullunā furū ‘u nab‘ahuwa aghşā nu dauhahu）。”帖木儿家族建立的莫卧儿帝国（Timurid Mughal empire）的宫廷史学家阿布-法兹勒（Abū al-Faẓl, -1602）在他的著作中也认为帖木儿家族成员是“蒙兀儿”人（sha‘b-i Mughul）。他把帖木儿家族的远祖称作“蒙兀儿兀鲁思”（ulū s-i Mughul）或“蒙兀儿部落”（qaum-i Mughul）。

帖木儿家族政权以外的地区的一些作者也认为帖木儿是“蒙兀儿（蒙古）”人。例如，在描述他自己和帖木儿的会面时，伊本·卡尔敦称帖木儿为“蒙兀儿人和鞑靼人的苏丹”（the sultān of the Mughul and Tatar）。《奥斯曼家族编年史》（Tevārīḫ-i Āl-i ‘Oşman）的作者凯马尔帕夏扎德（Kemalpaşazāde）称帖木儿的军队为“鞑靼”人。奥斯曼帝国的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把帖木儿识别为“蒙兀儿”人，说他出身于“鞑靼”人中的巴鲁刺思部落（ulus-i Barlas nām Tatar kabīlesi）。穆斯塔法·阿里还记载道，帖木儿在征服安纳托利亚后，按照“蒙兀儿”人的习俗（Moğul āyīni）举行了一次庆功宴。埃弗里亚·切列比在他的《游记》（Seyāhatnāme）中也把帖木儿识别为“鞑靼”人。他反复用“鞑靼”一词来指代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克里米亚汗国的黄金家族和部众。在描述克里米亚汗国的老克里木城（Eski Kırım）时，切列比这样写道：“老克里木城如此重要，以至于旭烈兀（Hülegü）统领的鞑靼军队，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统领的鞑靼军队，帖木儿（Temür）统领的鞑靼军队，脱脱迷失（Toqtamış Khan，译者注：术赤兀鲁思/金帐汗国的汗）统领的鞑靼军队，都曾兵临克里米亚，在烧杀抢掠一番之后撤兵（bu Eski Kırım sebebiyle Hulāgū Tatarı ve CingizHān Tatarı ve Timur Leng Tatarı ve Tohtamış Hān Tatarları Kırım’ a gelup nehb[u]gāretler edup gitimişlerdir）。”

克里米亚汗国的游牧人群被埃弗里亚·切列比识别为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这些人群直到公元 16 世纪初还一直保留着“蒙兀儿（蒙古）”的自我认同。克里米亚汗国的梅赫梅特·克烈（或译为“吉莱”）一世汗（Meḥmed Girāy, 公元 1514-1523 年在位）在他致波兰国王的信中，声称自己是“所有蒙兀儿（蒙古）人的汗”。梅赫梅特·克烈汗的信中，他的称号是这样的：“大帐伟大的汗，钦察草原和所有蒙兀儿（蒙古）人的皇帝梅赫梅特·克烈汗（ulu ordanung ulu ḥanī Deşt-i Kīpçāq barça Moğul pādşāhī Meḥmed Girāy Ḥan）。”除此以外，克里米亚汗国的编年史也把最初的蒙古各部和克里米亚汗国的部众等同起来。对两者的叫法都是“鞑靼”（Tatar）。例如，前文已经提到，《史源》（‘Umdat al-aḥbār）把包括克里米亚鞑靼在内的钦察草原（金帐汗国）游牧人群称为“蒙兀儿（蒙古）和鞑靼各部”（qavm-i Moğul ve Tātār）。

河中地区的（黄金家族昔班系）乌兹别克（月即别）汗国（Uzbek Khanate）的统治阶层也用“蒙兀儿（Moghul）”一词来指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部众。例如，穆罕默德·昔班尼汗（Muḥammad Shībānī Khan, 公元 1501-1510 年在位）在一篇他用察合台文创作的抒情诗（ghazal）中，称呼他自己的部众为“蒙兀儿”。他这样写道：“所有百姓都容纳于我，但我在他们之上（统领他们）。善恶是非都容纳于我，但我在蒙兀儿诸部之上（统领他们）（Barça ulus mendāsiğar, men bu ulusa siğmasam. Yahşī yaman mendāsiğar, men bu Moğula siğmasam）。”希瓦汗国弘吉刺王朝（Qunghrat Uzbek dynasty）史学家穆尼思（Mūnis）和阿加希（Āgahī）在公元 19 世纪初撰写



的《花刺子模史》(Firdaws al-Iqbāl)中,把他们已经突厥语族化的弘吉剌部的领主们称为“蒙兀儿之一部”(aqvām-i Moğul)。布哈拉汗国(译者注:当时由来自阿斯特拉罕汗国的黄金家族统治)史学家麻赫穆德·伊本·瓦力把他的领主,黄金家族秃花帖木儿(Toqay-Timur, 术赤第十三子)后裔纳兹尔·穆罕默德汗(Nazr Muhammad Khan),和布哈拉汗国的秃花帖木儿王朝(Toqay-Timurid Uzbek dynasty)描述为“蒙兀儿”。在他的著作《美德的奥秘》中,他是这样命名介绍乌兹别克汗国诸汗的那部分的:

从诺亚之子雅弗开始到如哈里发一样尊贵的纳兹尔·穆罕默德汗之间的蒙兀儿诸汗生平  
(dar tauz ī ḥ-i aḥvā l-i khavā qī n-i Mughū l az badv-i zūhū r-i ṣubḥ-i vujū d-i mas'ū d-i Yā  
fis ibn Nū ḥ 'alayhimā al salā m tā ayyā m-i bā farjā m-i ḥaz rat-i khilā fat-rutbat Nazr  
Muḥammad Khā n ...)

同理,很好理解的是,穆罕默德·昔班尼汗的宫廷史学家鲁兹比汉·洪吉(Faḥlallāh b. Rūzbihān Khunjī)把当时被视为乌兹别克汗国一部分的后来的哈萨克汗国的部众(Qazaq)和“蒙兀儿”联系在一起。在《布哈拉来客纪》(Mihmā n-nā ma-i Bukhā rā)中,洪吉把后来的哈萨克汗国的部众等同于“鞑靼”,也就是黄金家族统领的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洪吉是这样描述哈萨克部众的:

哈萨克军队,在成吉思汗时代被称为“鞑靼”军队,他们令人敬畏的勇猛和尚武,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尽人皆知并提及。(ṣaulat va ba's-i shadī d-i 'askar-i Qazzā q ki darzamā nh  
ā -i sā biq ki bi'ā dī -i zūhū r-i Chingī z Khā n bū d, ī shā n-rā lashkar-i Tā tā rguftandī  
mashhū r va mazkū r-i alsina-i 'arab va 'ajam ast)。

哈萨克汗国后人对他们自己源流的理解估计和洪吉的差不多。根据公元 19 世纪末期 N·I·格罗德科夫(译者注:曾任俄罗斯帝国阿穆尔省总督)的记录,一位叫苏丹·卡纳耶夫(Sultān Qanaev)的哈萨克人有过这样版本的故事,说哈萨克人源自“三百蒙兀儿(蒙古)勇士”:

从前有两兄弟,蒙兀儿(蒙古)和鞑靼。哈萨克源自前者,蒙兀儿的后人和鞑靼的后人打了起来,被鞑靼的后人击败了。三百个勇士幸存下来并开始称呼自己“三百勇士”。他们一度在一个山谷里避难,后来繁衍生息,走出山谷,重回草原。

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y Vasilievich Radlov)在公元 19 世纪搜集整理的一部口头文学作品中,哈萨克汗国的后人被描述为成吉思汗出身的部落联盟的后裔。虽然“蒙兀儿(蒙古)”一词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出现,但我们可以推论说,哈萨克汗国的后人并不把公元 13 世纪时的蒙古高原各部视为“外人”。

很多伊儿汗国、帖木儿王朝和乌兹别克汗国的宫廷史学家编纂的史料,在梳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世系时,也把“蒙古高原各部”和“突厥”两个词在概念上等同起来。尤其明显的是,这些官方世系谱往往声称,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出身于雅弗后裔且是内亚游牧人群中最尊贵的那一支。拉施特·哀丁在他的《史集》中呈现的黄金家族世系,是当时蒙古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传统史观的一种结合。根据拉施特·哀丁整理的世系,成吉思汗的远祖是诺亚(Nūh)的儿子雅弗(Yāfas),又叫亚布尔加汗(Abūlja Khān),雅弗的后裔是乞颜(Qiyān),他和捏古思(Nukūz)到名为额尔古涅昆(Arkana-qūn,意为“四面都是崖壁的山谷”)的一个植被茂密的山谷中避难,之后是孛儿帖赤那(Būrta Chīna)埃米尔(amīr),之后是阿兰豁阿(Ālān Quvā);



阿兰豁阿是成吉思汗的一位女性远祖，她通过感光受孕，生下了三个儿子，包括孛端察儿（Būzanchar）；之后是敦必乃汗（Tūmina Khān），他是合不勒汗（Qabul Khān）和合出里（Qāchūlī，译者注：即帖木儿的远祖）的父亲。在这部世系中，拉施特·哀丁把蒙古高原各部称作“蒙兀儿（蒙古）突厥”（Turk-i Mughūl），并把蒙古高原各部和其他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部落联盟（Atrāk-i ṣaḥrā-nishīn）的来源追溯到雅弗的儿子迪布·巴库伊（Dīb Bāqūy）。然而，拉施特又将蒙古高原各部和古兹（乌古斯）各部（aqvām-i Ūghūz）区别开来，他说古兹各部源自雅弗的儿子乌古斯（Oghuz）后裔中的 24 个支系，乌古斯因其皈依一神教而闻名。

帖木儿帝国的史学家阿里·亚兹迪（Sharaf al-Dīn 'Alī Yazdī, -1454）采用并进一步扩展了拉施特·哀丁的“雅弗系”黄金家族世系。亚兹迪为帖木儿之孙（译者注：沙哈鲁之子），统治设拉子及伊朗西部地区的易不拉欣苏丹（Ibrā hī m Sulṭā n, 公元 1415-1435 年在位）编纂了《胜利纪》（Zafarnā ma）一书，其中“引言”（muqaddima）部分，亚兹迪为雅弗（Yāfas, 又叫 Abū al-Turk）建构了一个儿子叫“突厥”（Turk）。亚兹迪的神话叙述称“突厥汗”（Turk Khan）为“突厥”人的远祖并发明了毡帐和游牧的生活方式。他进一步建构了另一个神话人物叫“蒙兀儿（蒙古）汗”（Mughūl Khan），蒙兀儿的双胞胎兄弟叫“鞑靼汗”（Tātār Khan）。兄弟两个都是突厥汗的后裔，蒙兀儿汗则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共同远祖。根据亚兹迪梳理的世系，蒙兀儿汗的后裔即蒙古高原各部，他们是突厥的一个分支。和拉施特梳理的世系不同的是，亚兹迪给成吉思汗加了一个远祖，叫乌古斯（Ughū z），并把乌古斯描述为蒙兀儿汗的后裔。除此以外，亚兹迪的神话故事叙述道，蒙兀儿汗的后裔和鞑靼汗的后裔发生了冲突，后者将前者重创并几乎消灭殆尽，唯有乞颜（Qiyān）和捏古思（Nukūz）以及若干女性幸存者得以逃至额尔古涅昆山谷避难。《史集》中提到的阿兰豁阿（Alān Qū），孛端察儿（Būzanchar Qā'ān）及敦必乃汗（Tūmina Khān）亚兹迪也都提及了，并说他们都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共同远祖。根据亚兹迪的世系版本，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分别源自敦必乃汗的两个儿子，前者源自合不勒汗（Qabul Khān），后者源自合出里（Qāchūlī）。

亚兹迪的世系版本被帖木儿帝国的史学家们广泛地采用。兀鲁伯（Ulugh Beg）在他的著作《四兀鲁思史》中的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世系包括雅弗，突厥，蒙兀儿，蒙兀儿的双胞胎兄弟鞑靼，还有乌古斯。米尔·赫万德（Mīr Khvānd）的著作 Tārīkh-i Rauzat al-ṣafā 和他孙子赫万达米尔（Khvāndamīr）的著作《传记之友》（Ḥabīb al-siyar）中的世系和亚兹迪著作中的世系相同。帖木儿家族建立的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史学家阿布·法兹勒（Abū al-Faẓl, -1602）的著作也是重复亚兹迪的世系。

黄金家族昔班系（Shibanid）的乌兹别克汗国以及布哈拉汗国的秃花-帖木儿王朝（Toqay-Timurid）的宫廷史学家们，也是根据伊儿汗国或帖木儿帝国史学家的世系来整理自己的王朝世系的。例如，公元 16 世纪中叶用察合台文书写的作者佚名史料《昔班尼传》（Shībānī-nāma），在其黄金家族世系部分列出了以下人物：雅弗（又称 Abū al-Turk）、突厥、蒙兀儿、乌古斯、乞颜、阿兰豁阿、敦必乃汗、合不勒等为成吉思汗的远祖。哈菲兹·塔纳什·布哈里在他的著作《诸王功绩纪》（Sharaf-nāma-i shāhī 或 Abdallāh-nāma）中写道，他的领主阿卜杜拉二世汗（'Abdallāh Khan II, 公元 1583-1598 年在位）的远祖们先后依次为雅弗，又被称作伊儿察汗（Īlcha Khān）、迪布·巴库伊（Dīb Bāqūy）、蒙兀儿、乌古斯、乞颜、捏古思、阿兰



豁阿、孛端察儿等。布哈拉汗国史学家麻赫穆德·伊本·瓦力 (Maḥmūd b. Amīr Valī Balkhī) 在他的著作《美德的奥秘》中, 也把雅弗、突厥、蒙兀儿、乌古斯、阿兰豁阿以及孛端察儿 (Būzanjar Khān) 列在黄金家族的世系中。布哈拉汗国的另一位汗, 巴尔赫 (Balkh) 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穆克木汗 (Muḥammad Muqīm Khān) 的宫廷史学家穆罕默德·优素福·门希 (Muḥammad Yūsuf Munshī) 在他的著作《穆克木汗文书集》 (Tazkira-i Muqīm Khānī) 也梳理了黄金家族的世系, 其中列出了雅弗 (又称作伊儿察汗)、阿兰豁阿、孛端察儿、敦必乃汗等。

希瓦汗国的黄金家族阿刺卜沙王朝 (‘Arabshāhid, 以昔班系阿刺卜沙汗命名) 和非黄金家族的弘吉刺王朝 (Qunghrat), 以及浩罕汗国 (Khoqand) 的明部 (先前昔班系乌兹别克汗国下的一个部落联盟) 王朝 (Ming dynasty) 的史书也遵循类似的传统来梳理其统治家族的世系。希瓦汗国的阿布·加齐·巴哈杜尔汗在他的察合台文著作《突厥世系》 (Şejere-i Türk) 当中, 把成吉思汗呈现为雅弗、突厥、蒙兀儿、乞颜、阿兰豁阿等神话人物的后裔, 并把“蒙兀儿” (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 人称为“突厥”的主支。希瓦汗国弘吉刺王朝史学家穆罕默德·米拉布·穆尼思 (Shīr Muḥammad Mirāb Mūnīs) 在其著作中也是这么梳理的。浩罕汗国的史学家毛拉·阿舒尔 (Niyāz Muḥammad b. Mullā ‘Ashūr) 在其于公元 1871-1872 年为胡达雅尔汗 (Khudāyār Khān, 1845-1875 年在位, 期间有中断) 编纂的编年史《沙鲁克王朝史》 (Tārīkh-i Shāhrukhī, 译者注: 沙鲁克为明部首领, 浩罕汗国的创建者) 中对亚兹迪的帖木儿家族世系进行了修改, 已达到把浩罕汗国统治家族和巴布尔 (Zahīr al-Dīn Muḥammad Babur, 译者注: 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 联系起来的目的。毛拉·阿舒尔也把雅弗、突厥、蒙兀儿、乞颜、阿兰豁阿及孛端察儿列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共同远祖。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上述黄金家族或非黄金家族政权的官方史书都给予了使用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的政权 (如奥斯曼帝国) 在显赫性和正统性上低于黄金家族的地位。例如, 亚兹迪在把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帖木儿家族描述为雅弗的一个儿子突厥的后裔的同时, 把土库曼人描述为雅弗的另一个儿子曼萨克 (Mansak) 的后裔。亚兹迪还讲述道, “突厥人” (Turk, 指代对象包括蒙古高原各部) 和“土库曼人” (Turkmen) 从雅弗的儿子突厥和曼萨克的儿子古兹 (Ghuzz) 时代开始就是世仇。相类似地, 兀鲁伯把“土库曼”和包括蒙古高原各部的“突厥”区别开来, 并说“土库曼”是曼萨克后裔而非突厥后裔。兀鲁伯甚至将“土库曼”描绘为“最劣的突厥语部落” (badtarīn aqvām-i Turk)。兀鲁伯还补充道, 奥斯曼家族是雅弗的另一个儿子秦 (Chīn) 的后裔。兀鲁伯的论点是, 奥斯曼家族的祖先“乌古斯汗” (Ughūz) 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及帖木儿家族的祖先之一“乌古斯汗” (Ughūz) 不是一个人物。奥斯曼家族的祖先乌古斯汗是秦的后裔, 而黄金家族及帖木儿家族的祖先乌古斯汗则是突厥汗和蒙兀儿汗的后裔。米尔·赫万德在他的著作 Tārīkh-i Rauzat al-ṣafā 中对土库曼人的定义和亚兹迪, 兀鲁伯的类似。他清楚区分了“突厥”和“土库曼”, 说土库曼和突厥不是一个人群, 而“土库曼”这一名称的来源是因为“他们长得像突厥人 (Turkmān qaumī ‘alāhidda-and varā-i Turkān vaīshān rā bi-vāsita-i mushābahat bā atrāk Turkumān gufta-and)。”和兀鲁伯一样, 米尔·赫万德也把“土库曼”描绘为“最劣的突厥语部落” (badtarīn ṭabaqāt-i Turk)。赫万达米尔在他的著作《传记之友》 (Habīb al-siyar) 中, 重申了他祖父米尔·赫万德的观点, 即“‘土库曼’不同于突厥, 与突厥无关 (Turkmān qaumī



‘alāhidda-and va bi-Turkānnisbat-i qarābatī nadārand)”，而且他也把“土库曼”描绘为“最劣的蒙兀儿（蒙古）部落”（badtarīn aqvām-i Mughūl）。

比较而言，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学家们并不像黄金家族或帖木儿家族政权那样对把统治家族和“突厥”这个内亚游牧人群的统称联系起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是仅仅把奥斯曼家族描绘为神话人物“乌古斯汗”的后裔。例如，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宫廷史学家们知道“突厥汗”（Turk Khan）在中亚地区被奉为所有游牧人群的远祖，他们在自己梳理的王朝世系中并未提及类似“突厥汗”之类的会被奉为所有内亚游牧人群的远祖的神话人物。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世系传统和黄金家族或帖木儿家族政权的传统差异越来越大，尤其体现于对波斯人（伊朗语族人群）的世系的描述上。例如，奥斯曼帝国宫廷史学家阿谢克帕夏扎德（Āşıkpaşazāde）把波斯人也列为了是雅弗的后裔。凯马尔帕夏扎德在他的著作《奥斯曼家族编年史》中甚至摒弃了“雅弗系”的世系编年传统，而是把乌古斯（Oghuz）和奥斯曼（Osman）描绘为诺亚的儿子闪（Shem）的后裔，这样就能够让奥斯曼家族和波斯（伊朗）的皇帝（pādshāh）们“形成”亲戚关系。在夺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后，奥斯曼帝国的世系编年传统甚至对乌古斯汗都不太感兴趣了，而是开始把奥斯曼家族的源流和阿拉伯人或拜占庭人联系在一起。总之，奥斯曼帝国前后变化多样的世系传统，说明其对“突厥”这个内亚游牧人群的统称的认同感并没有中亚地区黄金家族或帖木儿家族政权的那么强烈。

## 结论

本文中，我通过探究“突厥”（Turk）一词的用法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异同，旨在澄清蒙古帝国解体以来，中亚地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Chinggisid）或帖木儿家族（Timurid）政权精英中“突厥”（指代所有游牧人群，尤其是迁自蒙古高原的各部）认同的性质和含义。

“突厥”一词最早用来专门指代（前）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的核心部众“蓝突厥”（Kök Türk）。然而，从后突厥汗国被回鹘汗国所灭以来，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群中逐渐不再使用“突厥”一词，尤其是诸如回鹘，黠戛斯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联盟并不认同自己和“蓝突厥”是一群人，更不会将“突厥”用作自称。与此相一致的是，中世纪用汉文，吐蕃文，回鹘式蒙古文等编写史书的作者们也并没有用“突厥”一词来统称内亚所有的游牧人群。与此不同的是，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史书作者们倾向于把内亚地区的游牧人群看成一个整体，即使这些人群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语言背景，所以穆斯林世界通常把“突厥”一词用作内亚游牧人群的统称。

近现代以前的内亚地区，游牧部落联盟往往由语言背景多样的各种部落组成。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和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部落时常可以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譬如公元13世纪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与此相一致的是，无论是用“突厥”一词泛指内亚游牧人群的穆斯林世界的史学家们，还是用“突厥”一词专门指代“蓝突厥”的古代中原和内亚东部地区的史学家们，都没有把内亚游牧人群按语言背景来进行分类。反倒是近现代的历史学家越来越把“突厥”一词等同为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群，并把这些人群与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群区别开来。换句话说，我的论点是，如果把近现代以前内亚地区游牧人群的“突厥”认同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突厥语族”（Turkic-speaking）等同（混淆）起来的话，就相当于把东征的十字军等同为“法国人”，

仅仅因为阿拉伯语里称呼十字军为 *Ifranj*，而古法语又是十字军政权耶路撒冷王国（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的通用语言。

蒙古帝国时代和蒙古帝国解体后的中亚地区，西迁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他们突厥语族化的后裔们对“突厥”一词的用法和穆斯林世界长期以来的用“突厥”一词统称内亚所有游牧人群的传统是一致的。因此，本文的论点是，**穆斯林世界众多作者在概念上将“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突厥”等同起来的用法，不应该理解为是西迁中亚地区和钦察草原的蒙古高原各部在语言上突厥语族化的效应。**尤其重要的是，在近现代以前的中亚地区和伊朗地区，“突厥”一词是相对于指代定居的伊朗语族居民的“塔吉克”一词而用的，而并非“蒙兀儿（蒙古）”一词的反义词。而且，人口以游牧民为主体的钦察草原（译者注：即金帐汗国）地区在中世纪也不使用“突厥”这个词来指代西迁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他们突厥语族化的后裔们。同理，蒙古帝国解体后，中亚地区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昔班系乌兹别克汗国）和帖木儿家族统领的西迁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和他们突厥语族化的后裔们在自称“突厥”的同时，继续视自己为“蒙兀儿（蒙古、蒙古帝国后人）”人。

最后要总结的是，中亚地区各黄金家族或帖木儿家族政权的王朝世系中将成吉思汗以及帖木儿追溯为雅弗的儿子突厥汗（Turk Khan），蒙兀儿汗（Mughū l Khan），阿兰豁阿（Alan Qo'a）等神话人物后裔的这种宣称，是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各部及其后裔是内亚游牧人群中最显赫的一支”的一种表达。本文论证说，**中亚地区和伊朗地区各黄金家族或帖木儿家族政权编纂的官方史书和世系中的“突厥”认同，是他们对自己是成吉思汗后裔的自豪感的独特表达方式。**

本文尝试广泛围地运用和整理不同文种和文化背景的各类原始史料，来澄清蒙古帝国解体以来，黄金家族或帖木儿家族政权的“突厥”认同的性质和含义，并以先前史学研究中很难达到的详细程度来全景式地探讨“突厥”一词的在古代，尤其是在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的用法。因此我也希望，本文本身也能被视为对“突厥”一词从最早仅仅指代某个部落联盟到后来成为横跨欧亚的各人群的一种泛称的“奇异”的历史过程的一个梳理和再现。

